

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研究

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可能与现实

——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

赵卯生

【提要】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承接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的价值旨趣，探寻生态危机下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理论构建基础的自觉意识映现出其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红色性质，然而，带有折衷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模式亦具有明显的乌托邦特性。

【关键词】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人与自然双重解放

中图分类号) B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12)02-0019-08

如何看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问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把“本体论对‘何以可能’的追问定位为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从而变革了传统本体论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抽象思辨，实现了本体论的理论内容的变革。”^①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否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价值旨趣呢？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原创与典型形态，^②致力于生态危机下的马克思主义重建，力图将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自然的解放”概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传统视阈之中，探寻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通过研究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评析其理论特征，揭示和明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的“红色”性质，无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研究都具有特定的意义与价值。

一、生态危机下人的解放

北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本·阿格尔(Ben Agger)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概念，并在北美马克

思主义前途意义上，提出“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20世纪60~70年代，在北美学术界出现了一次最为举世瞩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大回潮，其最大特点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期间，不仅出版了若干以马克思主义为论题的书籍，还创办了一系列专题刊物。^③阿格尔正是在这一思潮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和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一样，阿格尔立志于重新阐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适应当代

^① 孙正聿：《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

^②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也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有原创性的方面。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文化哲学和辩证法的原创性研究毫无疑问地归于西欧马克思主义哲学，惟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源于北美，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贡献于世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何萍：《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美国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③ 参见[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北美现实斗争的需要，希冀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阿格尔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方法，“一种把解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设想与被压迫人民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的方法。”^① 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亦被称为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即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资本主义危机模式理论。这三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它们体现了马克思在不同层次上对社会主义革命根本要素的思考。其中，异化理论侧重于从哲学层面思考革命的主观要素，即革命的意志动力：由于马克思把异化与造成这种异化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由此，消除异化也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侧重于从经济层面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即革命的结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规律”——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逐渐自我毁灭的社会制度。当然，内在矛盾的成熟只是有助于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至于这些危机能否为工人阶级所识别并据此采取革命行动，则将是另外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危机模式理论在经验层面思考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既不会自动地发生，也不只是人的意志的产物，即使具备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如果没有经验的危机趋势，没有危机和崩溃的实际发生，革命就缺乏契机，就不可能把资本主义变革成为社会主义。在充分肯定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内都将持续有效的基础上，阿格尔强调，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概述的危机模式理论应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和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断修正，否则，将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带来损害。其后他对近百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系统梳理和精要分析，就是在阐明这一问题。

阿格尔着重探究了：1. 以考茨基的理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中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未能区分逻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迫在眉睫的深刻危机看作马克思“正确地”预见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可靠证据，消极坐等革命到来，致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指导和帮助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潜在能力，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危机与错失革命大好时机的严重后果。2.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错误地认为二战之后的欧美资本主义已不再受其内在矛盾的困扰和危机的制

约，同时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已完全衰落，而从一种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逐渐转变成一种同工人阶级失去联系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蜕变为一种空洞的美学救赎论的严重后果。在此基础上，阿格尔指出这两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都未能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精髓”。前者夸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倾向，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宿命论的决定论；后者夸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倾向，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哲学形式的社会批判理论。阿格尔强调，“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表面抵触，实质一致：它们都不再使马克思主义发挥政治功能了，换言之，它们都未能真正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如果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于刻板地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而错误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能动作用的话，那么，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由于确信垄断资本主义可以无期限地遏制其危机趋势，对工人阶级解放的可能性不再抱有希望，而主动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能动作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真的可以消除或者无期限地遏制其危机趋势吗？阿格尔指出，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严峻现实（在加深劳动异化的同时，又呈现出明显的污染环境和掠夺资源的趋势）对此给出了否定性答案，“20世纪60年代的曙光并没有像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示的那样导致一个富裕的后工业社会。相反……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无论就其经济行为还是就人的动机和意图来看，都已为进行根本变革准备了成熟的条件。”^② 在阿格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许多进行激进变革的新机会，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及时修正过时的危机模式理论，提出一种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当代状况并能促进阶级激进行动的新意识理论。之后，阿格尔考察了以马尔库塞（晚期）和萨特等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阿格尔强调，恢复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激进气质的过程远未完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一种能使他们围绕20世纪60~70年代的重大主题建构阶级激进主义，并把它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特殊危机点的危机模式理论，所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我们会努力进一步发展这些模式……形成一种能考虑创造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理论。”^③ 这就是阿格尔考察近百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演化历程后得出的结论，其着力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①②③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4、364页。

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并不能消解其危机趋势，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将危机趋势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由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而已。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更为适应，它将为社会主义变革战略提供具体的经验展望。立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阿格尔提出“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了辩证法”的核心概念，用来探求当代人的需求变化和现代阶级激进主义的需求结构，为社会主义变革寻求主观意志动力；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命题，并构建起“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理论，为消解工人的异化劳动以及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允诺一个光明前景，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该嫁接到美国民粹主义之上的观点，探讨社会主义变革新方案，为马克思主义在北美发挥政治作用找寻现实土壤。^① 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证，阿格尔立足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北美社会的深刻生态危机，重新阐释与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希冀复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而整合传统产业工人的阶级斗争和以生态运动为主导的新社会运动的力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阿格尔仅是根据时代主题的变换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需要，从经验层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模式，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理论基础何以可能的问题，他并没有给予系统论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以奥康纳和福斯特为核心的两大学术群体，它们沿着各自不同的逻辑理路，密切联系现代生态学理论和当代绿色主义者观点，在哲学层面论证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各具特色的政治生态理论。

二、文化唯物主义的构建 与人的解放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 Connor）通过把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以彰显其潜在的生态学基因，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生态学的联接；通过“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以及“复苏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论断，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工程；希冀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通过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在天亮的时候却折起了它的翅膀，奥康纳揭示出，正当世界经

济真正凸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种模式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却被当作一种有致命缺陷的理论、一次失败的思想努力而遭到了拒斥。鉴于此，奥康纳强调，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前提是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可信度，“在思想开放的怀疑论者认可存在（或能够存在）一种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可信度首先应该被建立起来。”^② 那么，马克思主义可信度的基点又是什么呢？奥康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之处在于它对阶级斗争概念和事实的指认，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过程中不可或缺。然而，就在生态斗争正日益成为全球最大斗争场所的当今时代，相当部分的学者，尤其是绿色主义者却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联结关系更多持怀疑态度，“直到今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除了被看作是两个相对的或相互拒斥的概念之外，还很少被有机地联系起来。”^③ 因此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出路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改革”。在如何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的问题上，奥康纳认为，鉴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存在着生态学的理论空场，缺失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应首先思考自然界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问题。其正确做法是以外在补充和完善的方式，通过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扩展其外延，把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潜在生态学基因彰显出来，建构起“自然、劳动与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奥康纳以“协作”范畴为介入点，着重从文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自然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自然—劳动—文化”的三位一体等三个层面展开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研究，其中，社会劳动概念仍然保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中的核心地位，而文化范畴与自然范畴则对其进行了质疑和丰富。

奥康纳建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学体系，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一方面是为了突破历史唯物主义狭隘技术决定论的传统模式，以建构起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是为了建构其自身的政治生态学理论，以开展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工程。

^① 具体内容可参见拙作《生态危机下人的解放：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②③}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在奥康纳看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危害,首先是进一步加剧了19世纪以来社会内部不平等的程度,其次还使另外一个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即资本与自然的严重对立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构建起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使之能帮助我们在阐释原有的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又能对全球环境被破坏问题作出清晰的思考呢?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也许是一种关键性思路。从该理论看,当代资本主义“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同样,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由危机所导致的重新整合和重构(它们是以更为社会化的形式为发展方向的)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①奥康纳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其将导致由消费不足而引发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在本质上创造出一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性,其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构成社会转型的直接目标;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外部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外部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而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以及由资本赢利空间缩小而引发的“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并在本质上创造出一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性,其中,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力量,以增强对生产条件的控制为目的的社会关系的重建被视为社会转型的直接目标。奥康纳强调,对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与第二重矛盾的综合研究,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的内在联合的意义与价值,即只有两者的内在联合才是实现社会激进变革的必由之路。换言之,在全球资本的总体化面前,无论是传统的阶级斗争,还是当代新社会运动,单个来说都是软弱无力的,“要想同资本相对抗,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公正的、生态型的社会,特别需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必须发展某种统一的政治策略,如此才能同全球性的资本和那些不断壮大的全球性准国家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抗衡,在此容不得丝毫的迟疑。”^②否则,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必将在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导致其自身理论的解构。

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与生态的双重批判,奥康纳得出结论,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公平、生态正义的必然选择。当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并不是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奥康纳强调,与传统社会主义相比,生态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真正复活。具体来说,马克思

主义的创始人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的异化现象,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逐利润和资本积累。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导向追求“生产性正义”的价值理念。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却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如争取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充分就业等)。“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但后来却去致力于改革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由此,社会主义就否认了自己的第一原理。”^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超越,首先要做的就是复活社会主义的第一原理,把社会主义从定量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奥康纳在这里还专门讨论了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何以否认了自己的第一原理(生产性正义理念)的根本原因:它把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等同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甚至等同于国家主义。由此,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必须从意识形态上斩断它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联,以确保生态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和国际主义性质。奥康纳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界定,显然与当代新社会运动的国际化特征紧密相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理论性质的变化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突破了先前单一的民族性特征,进入了国际性发展的新阶段。”^④当然,奥康纳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界定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关注视阈正由北美向全球拓展。

三、生态唯物主义的建构 与人的解放

与奥康纳试图通过外在补充和完善的方式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不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试图通过内在挖掘和梳理的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生态学的联接。福斯特通过恢复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原貌的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通过运用

①②③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404、515页。

④ 何萍:《〈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序》,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以及当代政治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希冀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① 福斯特引用培根的名言说明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必须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上，重新讨论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代生态学的关系。以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布哈斯卡（Roy Bhaskar）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分类（唯物主义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参照，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自觉坚持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它不仅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而且在更普遍的自然观和科学观意义上，它也接受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具体而言，受伊壁鸠鲁的影响，马克思建构起了以反目的论为核心观念的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这种唯物主义不仅是非决定论和非机械论的，而且与生态学世界观不可分割地内在联接，它坚持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则建构起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基在这种本体论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上，马克思一方面认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模式必须被更加唯物主义的的分析方法所替代，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人类对自然的物质占有问题的钥匙。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变集中反映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他正力图构建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三者之间的统一。正是在该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引入“联合生产者”概念用以废除造成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而这一“联合生产者”概念对马克思后半生的共产主义理论起了鲜明的积极作用。沿着这样的逻辑思路，福斯特的哲学思维从历史观转向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了自然唯物主义。在系统分析生态学的唯物主义起源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重新建构起马克思的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福斯特大胆地进行了恢复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原貌的尝试，得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②的结论。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对当代生态讨论的最直接贡献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变换断裂现象的分析与批

判。当然，马克思本人关于物质变换断裂的讨论还仅是其浩瀚文库中的一个潜在思想，挖掘出这个潜在思想，经整理使之系统化，经建构使之清晰化，并引申出它的生态意蕴，这与福斯特的艰巨工作密不可分。依据福斯特整理建构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19世纪初中期的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内，土壤肥力的退化问题成为当时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与此相伴的则是城市日益增长的环境污染问题。现代土壤科学与化肥技术的兴起（以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的出版，以及劳斯（J. B. Lawes）的农业化肥新技术的应用与传播为代表）正是与增长田地肥力以支撑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代土壤科学和化肥技术的兴起不仅没能终结土壤肥力的枯竭问题，相反，关于这个问题却有一种不断新增的认识：新的方法只是有助于生态破坏过程的理性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土壤肥力的持续衰退呢？为什么农业危机并没有随着土壤科学和化肥技术的出现而终结呢？马克思（借助李比希等人的思想）道出了其中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利用土壤科学技术成就的能力受到资本主义城乡分离及其对抗性矛盾的制约，受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生产方式的束缚。福斯特指出，马克思首先使用生物学理论阐释了由资本主义的城乡分离以及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而引发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以食物和服装纤维的形式被运输到远离它们“出生”的地方，而同期城市中人类与动物的排泄物却无法有效收集并返回农业，土壤营养元素从乡村到城市的这种单方向流动使得土壤肥力的再生产发生困难以至不可能）是造成土壤退化和营养元素枯竭的直接原因。紧接着，马克思又使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了更深层次的生态批判：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过程中的断裂现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无法修复。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生产方式（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能得到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费用，即社会物质财富的单方向流动）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就在于，通过劳动者与土地的强制分离（由此形成资本主义大土地私有制）为资本主义大规模农业创造条件，通过城乡分离及其对抗性矛盾（由此形成城市无产

① [英] 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页。

②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Ⅲ页。

者)为工农业资本提供劳动力商品。因此,只要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存在,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就不可避免、不可消解。“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①

借助“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进而借助现代生态学理论揭示自然资本化的困境和技术良性改进的谎言(资本主义立足自身消解生态危机的两条最根本路径:一条是经济学路径,即自然资本化;另一条是技术路径,即技术良性改进),福斯特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损毁、破坏自然的最终原因,即“社会和生态相关的极其复杂的问题都可追溯到现行的生产方式。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这类问题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的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②由此,一个符合人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它应是社会主义的,并且建立在稳固的生态原则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正义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内在融合的“社会生态正义”(ecology of social justice)运动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建立以社会公平和环境正义为目标的生态社会主义才是目标所向。通过这样层层递进的论证,福斯特最终将人的解放、社会制度的革新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四、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

就传统而言,马克思主义始终被看作是对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和愿望的理论性表述,然而在北美(这里的形势与欧洲有所不同:在欧洲,工人阶级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不得不凝聚成一股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力量以便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在北美,社会民众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不像欧洲那样在根深蒂固的特权背景下进行,同时美国政治体制的开放性非常有助于容纳劳工的要求,这就使工人阶级更有可能被同化到改良主义的新政中),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并没有天然的有机联系,加之受由来已久的美国民粹主义之影响,与其说北美民众信奉共产主义,倒不如说他们更信奉个人主义。^③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北美生根发芽,为普通民众和各种社会力量,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新社会运动都广为接受,并自觉接受其理论指导?这是摆在北美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迫切而又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面向

现实,修正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为社会主义变革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及时把生态问题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视阈,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可以说,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在当代的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

1. 自觉坚持以(经过重建而与现代生态学内在联结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

北美马克思主义具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以使其与现代生态学内在联结,并在其上建构自身理论的自觉意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重新阐释与建构马克思主义之始,就已充分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可信度问题。阿格尔明确批判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应是一件陈列在东欧和中欧自然历史博物馆玻璃柜内的文物”的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关系到美洲工人和北美大学生的当代生活,是与雇佣劳动者密切相关的充满生机的理论体系。“我们为什么在1978年写这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认为它与北美人民有着直接关系呢?我们在这本书中所作的系统回答是:因为异化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存在,而且必然存在。”^④面对苏东剧变和马克思主义低潮,奥康纳明确提出,不能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在以任何形式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前,首先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可信性。在坚信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依然有效且不可或缺的基础上,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当代资本主义的严重生态危机,以及传统产业工人阶级斗争的日渐衰落和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现实状况,适时以新的和创造性的方法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态学改革,在搭建起历史唯物主义同现代生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同时,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生态批判,力图使其理论成为当代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北美重新发挥政治引导功能。那么,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以(经过重建而与现代生态学内在联结的)历史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②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③ 参见[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339页。

④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呢？加拿大著名学者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精辟分析可能有助于厘清这一问题。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其作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对它进行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否认其法则是历史的普遍规律，以期获得资本主义被取代和超越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关键成分首先在于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既强调其系统逻辑的特殊性，也强调其史实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恰恰是与当前流行的方式完全相反的：它研究资本主义体系的统一性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它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把资本主义当作历史的终结。”^① 伍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映现出建构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否定并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旨趣；映现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实现社会主义而解放人的“红色”性质。可以这样说，从阿格尔到奥康纳，再到福斯特，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红”变“绿”的色彩日益明显，但是它仍属“红色”理论，其理论旨趣是将“自然的解放”这一当代意蕴纳入到“人的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视阈之中，最终求得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们没有理由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②

2. 带有折衷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逻辑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强调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必要前提，这是其难能可贵之处。然而，在对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设计上，除福斯特等少数人主张实行公有制之外，阿格尔、奥康纳等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国家政权机构的民主化运行以及生产和技术的民主化管理，对消解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解放更具决定意义。阿格尔指出，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如前苏联）既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的解放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人们的异化消费以及由其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在前苏联那样的极权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实际支配工厂财产、作出生产决策和管理生产过程的并不是工人阶级自己，而是政府

官僚。毫无疑问，这种环境中的工人阶级依然是被异化劳动所控制而无独立性的受害者，他们的自由和幸福感受不可能来自生产领域（因为其在生产中不可能自由地实现自我表达），只能来自消费领域；由此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只会一味地扩大，其结果只能是人类异化的继续和生态危机的逼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格尔提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再发展新的支配关系，工人在拥有生产资料的同时，还必须对其劳动进行民主化和非极权化的管理。与阿格尔的思想类似，奥康纳亦明确指出，如果生产条件遭到忽视，生产性能受到损毁，并最终导致资本的生产能力受损的话，最直接的原因应当归咎于国家机构及其政策，而不是资本本身。他还专门详尽讨论了：虽然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生态学并不冲突，但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政权机制和民主制度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其在建设实践中仍对自然造成巨大损毁。由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将关注的焦点置于国家政治层面，构建民主的生态社会主义。“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以下这一点都是非常明确的：环境破坏的问题不应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当然，正是这个国家——如果能处在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控制之下——将会成为重建自然界，以及重建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的基础。”^③

阿格尔、奥康纳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将私有制和公有制混同起来进行批判，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经营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都不利于实现人的解放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建立一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市场与计划就其本身而论并不是不兼容的；混合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适宜的社会（经济）形式。”^④ 这是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其中民主基础上的计划是主要的，并辅之以适度的市场机制。这种企图超越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所谓第三种所有制形式在本质上带有明显

① [加] 艾伦·梅克森·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吕薇洲、刘海霞、邢文增译，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② 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 页。

③ [美]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7~248 页。

④ Grundmann Reiner,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 270.

的折衷主义倾向，它混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具有回避社会现实问题的改良主义倾向。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所有制不是社会性质决定因素的主张，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而且他们建构的这种生态经济形式由于其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中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空想，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

3. 生态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模式具有明显的乌托邦特性

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受 20 世纪 60~70 年代后现代主义反总体性原则的影响，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愿景构想中，信奉“小即美好”的舒马赫主义，坚信只有按小规模技术发展起来的，具有民主地组织和调节原则的生产过程才能使产业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管理系统中解放出来，从而把实施分散化、小规模、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作为消解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此反对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而易见，“小即美好”的舒马赫主义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在实践中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条件下，庞大的失业大军、严重的资源短缺以及人口爆炸等问题早已超出了一国范围，根本无法将其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部分；再者，就节约能源、循环经济和减少污染而言，小规模、分散化技术并不比集约化、大规模技术更具优越性，反呈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再来提倡小规模、分散化的经济体制，明显不符合社会现实。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摆脱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明确放弃了阿格尔的零增长的经济主张，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应保持适度增长，但他们仍然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理论，试图通过控制科学技术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生态问题。福斯特重提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城乡间较高层次的综合”问题，反对高度集中的城市化，借以修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奥康纳提出复活社会主义“生产性正义”的价值理念，倡导把社会主义从定量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期望通过反对生产力的发展和抑制经济规模的扩大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一致思想和主张。

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稳态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因为靠抑制生产力发展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更多是人类在当前状态下的一种进退两难的无奈之举，并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决生态问题，更无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企图把现代化大工业转换为前工业时期的小手工业，这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明确批判过这种“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是，“它……是空想的……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①

本文作者：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北京市高教学会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7~298 页。

Possibility and Actualization of Dual Emancipation of Mankind and Nature

——On the Purport of North American Ecological Marxism

Zhao Maosheng

Abstract: By carrying on the purport of emancipating mankind of Marxism, North American Ecological Marxism explores a wa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to emancipate mankind and nature in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consciousness of constructing itself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hows the red character of North American Ecological Marxism. However, the socialist ecological economy with eclecticism is not feasible, and the mode of steady economy of Ecological Socialism is Utopian.

Key words: North American Ecological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mancipation of mankind and nature